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深刻领会“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意蕴

刘 仓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总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两个结合”重大命题。“两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持“两个结合”，必须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方法论意蕴。

拓展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科学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其中的普遍规律。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进一步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丰富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立足于中国实际，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等一系列问题，亦都需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使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可以说，“两个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融合创新的科学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蕴含鲜明的实践方法导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坚持“两个结合”，客观上要求贯通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统筹“两个大局”，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主张和方案，蕴含着鲜明的实践方法导向。

“两个结合”拓展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崇高理想的成功道路。我们是在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论是开辟中国道路、创造中国理论，还是完善中国制度、发展中国文化，都可以从中国历史中寻找文化基因和根脉。观察历史中国是观察当代中国的一个视角，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

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两个结合”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坚持“两个结合”，就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更好挖掘中华文明孕育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厚植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根基。

“两个结合”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两个结合”的重要实践主题。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彰显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包含着“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崇高精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包含着“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包含着“富贵福泽”与“礼义廉耻”并重的思想精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包含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重要理念；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蕴含着“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两个结合”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财富，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深厚的思想资源、更为有力实践指引。

“两个结合”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两个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流融汇，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为探索开辟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决定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从民为邦本到人民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从文明止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和为贵到和谐社会，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

化生命体，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和实践意义，概括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和“六个必须坚持”都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

“两个结合”揭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六个必须坚持”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根本方法。“六个必须坚持”进一步阐释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遵循，是“两个结合”的逻辑延伸，是在坚持“两个结合”基础上的理论创造。

解决新时代中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的中国方案，需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结合”这个根本途径，首要的就是把握好“六个必须坚持”。“六个必须坚持”表明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根本立场，体现了党勇于开拓创新的歷史主动精神，揭示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规律，指明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实践主题，强调了推进人类进步和建设美好世界的责任担当，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坚持“两个结合”这个根本途径的基础上，“六个必须坚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着力解决由此岸到彼岸的“桥和船”的问题，“两个结合”和“六个必须坚持”都为观察现实、推动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和制胜法宝，是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金钥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越发呈现为一个多维多元的复杂系统。宏观层面，依靠某一种政策“单打独斗”已难以实现发展目标；微观层面，某一项具体措施的落地见效也需要一系列配套细则在执行上相互配合、补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打好政策‘组合拳’”作为提高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的一项关键举措，要求“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高政策整体效能”。这反映出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宏观经济治理的思路。

这几年，我国一再强调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就是因为在经济实践中经常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一些政策存在碎片化、条块化问题。或者同一领域“政出多门”，缺乏统筹；或者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衔接不畅，缺乏协调；或者缺少对政策效果和社会预期等方面的一致性评估，造成不同政策相互掣肘、效力相互抵消。越是面对复杂局面，就越要重视促进政策形成组合效应，打好“组合拳”，增强宏观政策实施效能。

第一，这有助于从横向上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政策工具的深度耦合。就宏观调控而言，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不同政策有不同目标和侧重点，如果政策间缺乏沟通协调，政策效果就难以彰显。例如，产业政策鼓励创新和转型，如果环保、监管等政策调整相对滞后，一些新兴产业就难以顺利得到关键要素支撑，具体项目现有的增量指标难以满足能耗指标需求。又如，现有部分行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面临投入压力，如果缺乏对转型成果的市场化评价机制，金融机构就难以准确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风险与收益，也就难以提供充分的信贷支持。

打好政策“组合拳”，才能产生“1+1>2”的叠加效应，推动宏观调控逐步走向更高层次的协同治理。需统筹谋划经济工作，加强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等的协调配合。明确各类政策之间的作用边界和衔接方式，一旦确定了整体发展战略或重大项目布局，就要相应地匹配产业扶持、环境保护、金融支持、要素配置、监管创新等后续政策，并对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前进行评估和预案设计，避免在政策目标或执行细节上产生明显矛盾。同时要重视非经济性政策通过影响生产要素供给、营商环境等对经济运行产生的各种影响，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各方面都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稳增长、稳预期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和抑制效应的政策。

第二，这有助于从时序上平衡短期效果与长期效益，避免顾此失彼。短期政策通常针对当下矛盾或紧迫需求，关注对局部问题的迅速缓解。例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会通过减税降费、降低利率水平、提高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和市场预期。此类政策的特征在于见效快，能够及时释放积极信号或提供直接支持。长期政策则更多关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深层次目标，强调系统性和前瞻性，力争为提升国家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若只靠短期刺激，容易造成资源聚集于落后或低效领域，损害未来发展潜力；反之，若一味强调长期的结构转型，却对当前企业生存、市场信心、民生保障关注不足，则容易错失机遇甚至引发更多问题。

打好政策“组合拳”，才能做到短期发力有准星、长期目标有定力。在出台短期政策的同时，需明确其与长期发展目标的衔接方式，实施阶段性减税降费或财政传导等，避免政策投资等需要提前考虑这些举措对产业结构、要素配置和环境资源的中长期影响。要加强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衔接，例如，短期财政补贴与长期产业升级并不冲突，但需在补贴的标准、时限、范围等方面做好制度设计，避免企业对补贴形成过度依赖，并与长远的技术升级、绿色转型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激励闭环。还要注重资源合理分配与要素优化配置，短期刺激也需为新兴产业发展预留足够的创新空间和资源配置渠道，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引导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向具有高成长性和竞争力的领域流动。

第三，这有助于从纵向上贯通“战略规划—政策设计—基层执行”全链条，减少政策传导损耗。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制定环节的科学性，还有赖于设计与执行的全链条贯通。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政策传导涉及战略规划、工具设计、资源调配、效果反馈等多个动态环节。实践中，常因“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衔接不畅使政策效能大打折扣。在前端，若缺乏对基层实际需求的深度调研，就容易出现“一刀切”，难以满足不同地区的多样化需求。在末端，若部分地方行政能力不足，缺乏人员、技术和资金支持，政策落地效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政策执行中跟踪监督机制不健全，可能导致“选择性落实”，从而进一步削弱政策效果。

打好政策“组合拳”，才能在政策传导过程中保证政策内在逻辑的一致和执行要求的清晰明确。在政策制定阶段，应强化多部门联动和实地调研，广泛听取基层诉求和建议，从而在政策设计之初就兼顾差异化的路径，为后续执行环节预留灵活空间。在政策执行阶段，应充分考虑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差异，适时提供人员培训、技术支持和资金补贴。在政策监督环节，应建立持续的政策效果追踪和反馈监测相关机制，特别是针对重点项目和重点地区实施精准化监督，确保政策目标不偏不倚地实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把握关键抓手深化区域产业协作

叶振宇

我国幅员辽阔，如何根据内外形势变化不断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培育新的增长极，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眼于增强区域发展活力，提出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进一步深化区域产业协作，推动产业有序梯度转移，将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抓手。

区域产业协作，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基于比较优势和互利共赢目标，在促进产业转移、强化产业链分工、共建平台载体、加强技术转移、开辟市场等领域开展产业合作的相关活动。多年来，区域产业协作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例如，东西部协作带动西部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增强了这些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东北一些地方利用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的机会，学习吸收了更先进的产业发展理念和园区管理经验，也找到了更多产业合作机会；有些中西部城市则通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链供应全国等途径加快发展步伐，迅速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制造基地，宜宾成为“动力电池之都”，包头打造国内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等都是实例。

新形势下，深化区域产业协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培育和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调整生产力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有效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另一方面，有利于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新路径，更好发挥经济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努力为实现现代化目标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新形势下深化区域产业协作的内涵目标、路径要求。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是基本条件。从要素禀赋、产业基础、发展环境看，东、中、西、东北地区作为承载国民经济活动的四大区域板块既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也有促进彼此产业合作的现实条件。即便是某个具体的行业领域，产业链上下游也有许多跨区域合作的机会。特别是科技创新赋能使得各地区能够获得动态的比较优势，从而易于孕育形成新的产业协作机会。如，“东数西算”工程正逐渐成为东西部产业协作的热点领域，不仅能拓展利用西部丰富低廉的电力资源，还能促进西部数据产业发展。

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动力支撑。以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进入商业化应用的爆发期，不仅拓展了区域产业协作的广度和深度，还可能改变区域产业协作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应用场景能够催生形成产业协作的现实生产力。目前，东部地区优秀的科技型企业

在通用大模型、新型储能等领域具有技术领先优势，可以利用这些新技术在中西部或东北地区开发基于特定行业的应用场景，促使越来越多受到市场认可的场景加快培育出具体业态，进而创造更多产业协作机会。同时，数智技术促进区域产业协作的方式从以前的实体合作逐渐转变为数实融合，这使得产业协作更有效率。

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是重要目标。当前，我国面临异常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引致的产业外迁压力较大，迫切要求四大区域板块深化产业协作，使产业继续留在国内且有更大发展空间。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也有一大批工业品产量跻身世界前列，但现有的产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明显，关键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产业布局不平衡不合理现象还比较突出，一些地区面临产业空心化风险。必须发挥大国综合优势，利用区域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梯度和比较优势深入开展区域产业协作，更好解决自身发展难题，有效应对内外外部挑战。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是重要保障。尽管四大区域板块在客观上存在发展差距，也有许多产业协作机会和共同利益，但并不必然能促成合作。这就要求在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制度安排下，不断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对其他区域板块的产业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区域融合发展，进而加快形成区域高效联动、韧性安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此外，还要发挥东部地区通过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等途径开展产业帮扶的作用，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链优势，独享产业发展收益，不愿与其他地区分享产业发展机会。三是区域间产业发展“内卷式”竞争愈演愈烈。有的地方不顾实际动员各类要素资源投入“高热度”产业发展中。这在客观上造成市场前景好的行业就容易出现投资过热，且迅速形成大规模产能，从而导致这些行业供需矛盾突出，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针对上述问题，各地区既需考虑当前实际情况，又需研判未来形势变化，坚持问题导向，采取精准有效的政策举措，深化区域产业协作。

一是深入探索发展飞地经济模式。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东部省份深化合作设立飞地园区、飞地科创基地等，探索共建共享的合作发展模式。支持平台型园区开发企业发挥园区规划建设、招商引资、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区域产业协作。相关企业也要坚持规范化、市场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通过自建、共建、托管等方式推进一批低效园区向飞地园区转型，协同促进产业转移与产业生态异地复制。

二是推动数智赋能产业协作创新。四大区域板块可依托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力量，围绕重点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规划建设“产业大脑”，发挥其高效配置资源、收集共享市场信息、优化整合供应链的作用，借助数智技术提高企业跨区域合作对接的效率。同时，还要努力为各类创新主体营造更加宽

松、包容、自主的创新环境，积极发挥比较优势合力实施场景创新、驱动产业协作。

三是探索完善产业协作利益共享机制。可考虑按照“中央备案、省级统筹、协议落实”推动跨省（区、市）合作的产业转移项目利益共享，探索属地征收、交足中央、余留分成、横向兑付的税收分享机制，建立项目产出属地统计核算、内部分享的机制，使产业转出地在合作协议有效期内能够分享产业转移项目的税收收益和发展效益。建立能源资源使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探索能源资源输出与资金补偿、产业转移相结合的利益补偿模式，吸引东部地区高载能产业向西部能源富集地区转移。

四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坚决清理不合规的优惠政策和歧视性政策，纠正以不合理价格出让土地等具有“逐底竞争”倾向的做法。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持续深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明显降低各类企业跨区域投资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修订部分妨碍要素资源正常流动和企业跨区域投资经营的法律法规，完善涉及属地管理的行业监管措施，推进资质资格、技术标准、检验检测等事项实现跨区域互认。

此外，还要促进区域重大战略融合贯通，充分发挥现代综合交通、创新网络的作用，促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区域创新要素顺畅流动和产业链创新链高效互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

